

全球體系、區域次體系與極數國定理： 攻勢現實主義的案例檢證

陳冠安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

張登及*

國立台灣大學政治學系教授

摘要

本研究認為，為更加切合國際關係的現實，必須從全球與區域層次重新修正國際關係理論的結構現實主義。攻勢現實主義雖然初步涉及全球—區域層次，提出區域霸權概念，不過由於該理論在本體論、體系結構理論和區域層次上的論述缺失，最終還是受到守勢現實主義框架的限制。本文因此以Barry Buzan和Richard Little的「互動能力」概念作為物質性建構的關鍵因素，使攻勢現實主義的本體論和體系結構觀得以動態化，並填補該理論在區域層次上的不足。本文也將區域層次作為全球層次的基礎，提出只有在區域層次贏得「區域霸權」，才能獲得全球層次「極數國」的資格，而全球層次的五大運作邏輯，本文稱為「極數國定理」。

由於攻勢現實主義已對全球層次有完整論述，因此本研究的案例驗證

* 張登及為本文通訊作者。

聚焦在檢視極數國定理對東亞區域體系的應用，闡明全球層次對區域層次的影響。討論範圍分別以戰間期至二戰、冷戰和後冷戰時期的東亞區域體系，論證不同全球極數情勢對區域層次的干預偏好，以及區域層次極性結構轉換對全球層次的影響，最後並提出美國為維持單極，對東亞、歐洲、斯拉夫三個次體系的干預預期，以充實改進版攻勢理論的政策關連性與運用性。

關鍵詞：結構現實主義、物質建構論、全球—區域層次、極數國定理

* * *

壹、緒論：再反省結構現實主義

一、結構現實主義之興衰

在過去很長一段時間裡，現實主義一直佔據國際關係理論的主導地位，顯示出現實主義相當能適應國際政治實踐而有所變化（Donnelly 2000, 1-2）。現實主義大師Kenneth N. Waltz就在冷戰期間，引領結構現實主義取代古典現實主義，為國際關係理論勾勒出一條更加科學的理路，以體系層次來闡釋國家行為，開創往後結構理論的大道（Buzan, and Little 2000, 33-43）。不過結構派並非穩居優勢（Donnelly 2000, 30-41），在冷戰時即有許多論者批評它過於靜態、無法解釋國際體系變遷、沒有轉化邏輯（Keohane 1986, 1-26; Ruggie 1986, 131-157; Wendt 1999, 10, 15-19）。因此當冷戰結束，結構現實主義無法解釋體系發生重大變化時，Waltz理論的風采就黯然失色，使現實主義典範在國關理論的洪流中飽受抨擊（Schmidt 2004, 428）。¹

雖然現實主義典範已不再獨執國際關係理論之牛耳，不過許多學者認為它仍高居國際關係研究的首要地位，顯示現實主義並未就此頹靡（Valeriano

¹ 造成結構現實主義隨冷戰結束黯然失色的另一個原因即Waltz的理論很大一部分係立基於冷戰兩極體系而成，使得Waltz的結構現實主義隨兩極冷戰的結束而衰落。（Cox 1986, 213-214）

2009, 179-180)。這其實仰賴許多學者的努力，其中，John J. Mearsheimer就以攻勢現實主義（offensive realism）為結構派注入了一道活水。有些學者甚至認為Mearsheimer的著作是Waltz以降，現實主義最重要的理論著作（Layne 2002/2003, 120-121; Toft 2005, 381）。作者認為，攻勢現實主義確實為結構現實主義帶來理論上的創見。最主要處在於攻勢派採用「全球－區域的雙層分析」，並且找回地理因素對國際關係的影響，深入探討Waltz所沒不曾處理的單極和「區域霸權」概念。

不過攻勢現實主義的創新卻也同時是其不足之處。由於其在本體論、體系結構理論和區域層次上的缺失，最終使得攻勢現實主義的全球－區域雙層分析有退回單層體系之疑慮，無法發揚Waltz當初為現實主義所帶來的理論突破。²所以本文的研究目的即在於檢視攻勢現實主義在本體論、體系結構理論和區域層次上的缺點，據此提出全球層次的運作邏輯：「極數國定理」，以及全球層次對區域層次的干預（intervention）依據，提出一種「全球－區域雙層分析」的結構現實主義，完善攻勢現實主義的理論修正。最後，本文也以20世紀東亞區域體系為歷史案例，進行修正理論所得成果的驗證。

二、攻勢現實主義的優勢與不足

（一）本體論：精簡的權力觀與被輕視的地理因素

Wendt（1999 4-5, 23-24, 96-98）認為研究國際關係必然涉及本體論（ontology），而本體論最主要的劃分包括物質主義（materialism）和觀念主義（idealism）兩種截然不同的類型，前者包含五種物質性因素：人性、自然資源、地理、生產性力量及軍事力量。一般來說，現實主義採取物質主義本體論，將體系結構視為物質性的權力分布（distribution of power）。表1即以Wendt對「物質」構成的差異，比較三種現實主義的看法。³

² Snyder（2002, 150-151）就認為雖然Mearsheimer在理論上有許多創新，不過仍未能取Waltz而代之。

³ 本研究採取Mearsheimer（2014, 17-22）對現實主義的分類，將Morgenthau歸為人性現實主義（human nature realism）、Waltz歸為守勢現實主義（defensive realism）、Mearsheimer則為攻勢現實主義。

表1 現實主義學派權力及物質構成要素之比較

	Morgenthau	Waltz	Mearsheimer
權力之定義	控制力	相對影響力	軍事能力
權力之物質	人性、自然資源、	自然資源、生產力、	地理、軍力
構成要素	地理、生產力、軍力	軍力	

資料來源：Morgenthau (1973); Waltz (1979); Mearsheimer (2014).

Morgenthau (1973, 27-33, 112-149) 為代表的人性現實主義同時採納五種物質要素，並將權力定義為控制他人意志和行動的力量。Waltz (1979, 129-131, 191-192) 為代表的守勢現實主義則認為權力並非是控制力，而是行為者的相對影響力，並且僅採納自然資源、生產性力量和軍事力量三要素。Mearsheimer (2014, 42-46, 55-60) 為代表的攻勢現實主義則將權力區分為實際權力和潛在權力，自然資源和生產性力量僅是潛在權力，一國的實際權力最終取決於軍事力量。另一方面，學者也指出Mearsheimer重新找回了Waltz捨去的地理因素（張登及 2008, 107；Snyder 2002, 151），認為地理會影響地面力量的投射能力和恐懼（Mearsheimer 2014, 83-84, 269-272, 329-333），為過往被批評高度抽象的結構現實主義帶來具體的地理景觀，貼近真實的國際政治脈動。⁴

攻勢派精簡化本體論的作法雖然在理論應用上有所助益，然而過度精簡卻也衍生出許多理論問題。由於攻勢現實主義將軍事力量等同於權力，僅將地理視為恐懼和投射能力的變項，無法直接影響權力，造成權力具有凌駕地理區域的普世性，使得攻勢現實主義的權力觀在概念上有空洞化的危險，並且連帶影響其體系結構觀。⁵

（二）體系理論：僅有全球而缺乏區域視角

有別於過往現實主義單層次的國際體系觀，Mearsheimer (2014, 40-42, 83-

⁴ 關於Mearsheimer將地理因素帶回理論的重要性，亦另見張登及（2017, 5-12）。

⁵ 恐懼具有心理成分。將恐懼視為變項，依照Waltz的結構理論精神，有化約主義之嫌，也違反攻勢現實主義的物質本體論（Pashkhanlou 2013, 207）。

84, 114-128, 138-140) 將體系區分為全球與區域體系，並且進一步認為由於巨大水體障礙影響國家投射力量，因此無法形成全球霸權，僅能成為區域霸權。也就是說，攻勢現實主義納入了地理要素，實際上已為體系理論增添了「雙層次」的全球－區域體系觀，改善Waltz被批評為靜態抽象的缺點。這個修正極為重要，十分有助於處理傳統結構理論難以探討具體區域情勢及全球與區域之間互動的困境。

但Mearsheimer僅以「水體」做簡略的全球 / 區域劃界，並未進一步對體系分區進行闡釋，他的區域劃界亦有重疊矛盾之處 (Toft 2005, 393)。⁶而在未界定誰是全體系行為者，又沒有具體劃分區域體系時，卻認為個別國家可以成為跨區域的行為者 (Mearsheimer 2014, 4-5, 41, 198, 225-233, 329-330, 355-356)，且未釐清全球－區域行為者各自資格，造成全球與區域體系的界線模糊，⁷最終使得攻勢現實主義退回只有全球層次，缺乏明確區域層次劃分的守勢視野，殊為可惜。

(三) 結構理論：仍然恆定無政府狀態

攻勢現實主義承襲結構理論，主張無政府的結構特徵導致行為者追求相對權力最大化。此外，攻勢理論也在堅守全球恆定無政府狀態的同時，主張國家可能成為區域霸權，進而從改變現狀者搖身一變，成為維持現狀者 (Mearsheimer 2014, 17-22, 29-46)。⁸這雖然改善守勢理論對霸權現象避而不談的問題，用「區域霸權」間接突破了結構現實主義「無政府狀態恆定」的假定：區域霸權即可能意味特定區域內存在層級體系 (hierarchical system)。然而攻勢理論卻並未從根本處闡明：(1) 是否存有無政府狀態以外的結構類型；

⁶ Mearsheimer (2014, 41, 144-145, 264-266, 360-363) 並未完整地提及其區域劃界標準以及成果，僅零星提到幾個區域，如西半球、歐洲、東北亞、非洲、中東、東南亞、南亞、亞洲大陸、亞洲，使得攻勢現實主義的區域體系有相互重疊和模糊不清的問題。

⁷ 對攻勢現實主義來說，區域霸權 (regional hegemon) 作為全體系之行為者並無疑義。然而大國 (great powers) 是否就是全體系的行為者？Mearsheimer則並未明說。而從其書中脈絡來看，由於其認為只有美國為唯一的區域霸權，卻又認為蘇聯同美國為超級大國，如果蘇聯不是另一區域的霸權，攻勢理論顯然對大國的標準沒有一致的定義，這當然是一項理論缺失。

⁸ 在邏輯上，攻勢現實主義認為國家成為區域霸權後會傾向維持現狀，就違反其無政府狀態導致國家追求相對權力最大化的假定。

(2)區域體系是否因擁有霸權而導致結構改變；(3)區域內其他行為者是否會因霸權存在而變為支持層級，抑或是仍追求挑戰現狀。也就是說，攻勢現實主義並未利用提出區域霸權和行為者行為改變的契機，來妥善處理有別於守勢現實主義被批評的靜態結構觀，即恆定無政府狀態。作者認為，攻勢理論提出「區域霸權」後的未盡之業，非常值得學界繼續檢討。⁹

貳、理論修正（I）：攻勢現實主義動態化

上節指出，攻勢理論在本體論和體系的結構分析上的疑義是環環相扣的。由於輕視地理對權力的影響，給予權力超時空的同質特徵，放諸全球和區域體系而被一體適用，並且在沒有提出有別於無政府狀態的結構類型的情況下，讓所有行為者無論處於什麼體系，皆受相同結構的制約，最終導致攻勢理論無法開創跨體系解釋變遷的分析，而有退回單層體系的疑慮。要完成攻勢理論未竟的理論工作，有必要對其本體論和結構理論進行若干修正，也就是需要朝「結構特徵動態化」的方向進行（張登及 2008, 104）。本文借鏡Wendt觀念建構結構的觀點，認為物質因素也可以建構結構，從而給予結構動態化的可能。¹⁰就物質本體論的立場來看，本研究認為國際關係最主要的物質性建構性因素，就是英國學者Barry Buzan所提的，融合地理與技術而成的「互動能力」（interaction capacity）。¹¹

一、本體論的動態化：互動能力的地理觀與控制能力的權力觀

在傳統上，現實主義相當重視地理因素對權力的影響。結構現實主義則為求簡約而捨棄地理因素，僅以單元間互動來界定體系範圍，成為守勢理論的

⁹ 即使採取全球－區域體系觀，然若採取靜態結構觀，最後仍會退回單一層次的體系觀。因為將國際體系分為全球與區域體系，但如果沒有賦予體系結構變動可能，認為無論什麼樣的體系都處於無政府狀態而排除區域「層級化」的可能，最終將難以解釋全球或區域體系的變遷。

¹⁰ Sterling-Folk（2002, 74）也認為建構主義可以修正現實主義的缺失。

¹¹ 採用互動能力作為建構性要素最主要的原因即在於，互動能力係為物質性因素。也就是說，在以互動能力作為建構性要素，避免過往結構現實主義過於靜態的同時，亦可避免走向Waltz之後建構派學者試圖添入觀念因素的嘗試。

基本特徵 (Waltz 1979, 79-81)。但Waltz的理論卻未說明單元間互動程度如何才足以形成體系。畢竟有的區域裡，單元互動稀疏，幾不成為體系；有的區域中，單元互動密切，幾乎整合成更大的單元 (Buzan and Little 2000, 18)。攻勢現實主義雖然找回地理因素，卻未給予其足夠重視，不僅沒有說明地理因素如何影響權力，亦未說明地理屬於體系性還是單元性特徵。總的來說，以往的結構理論不是忽視地理因素，就是僅將地理視為是既定因素，採取靜態的地理觀與區域觀。

Buzan和Little (2000, 11-12) 對「互動能力」的闡釋有助於回應上述靜態地理觀的缺失。他們指出互動能力是單元在體系內通過物資、人員和資訊流動相互聯繫的能力，涉及物質和社會體系中交通和通訊的速度、範圍和容量，¹²而越低技術的環境，互動能力就越受地理限制。當物質或是社會技術的進步，地理限制就會逐漸減弱。也就是說，技術條件制約下的地理因素約束單元互動，使單元互動並非既定不變，而會受到長期因素的地理和短期因素的技術所影響。¹³舉例來說，現代的越洋航海能力與可靠艦砲的建置，使散佈各大洲的無數大小政治單元被迫緊密地連結起來；資通、外空、核武、投擲、反飛彈系統的逐步創新，多次改變且擴大了強權對全球與區域體系的控制能力。

而當互動能力並非固定變項時，就代表受互動能力影響的體系亦非如守勢現實主義假定的一成不變。¹⁴互動能力對體系的規模、邊界都有相當影響。吾人可以認定，以技術與地理條件共同決定的互動能力，可以取代過往結構理論靜態的地理觀，在有助於維持攻勢理論物質本體論的同時，對體系和結構可能的變遷進行解釋。「互動能力」因素的介入，對於改善結構理論，幫助攻勢現實主義解釋全球與區域體系如何互動，重要性不言而喻。

¹² Buzan和Little (2000, 82) 認為有三個因素調節互動能力：地理、用於交通運輸和通訊傳播的物質技術，以及用於交通運輸和通訊傳播的社會技術。

¹³ Buzan和Little (2000, 80-84) 認為軍事—政治領域需要相當高的互動能力才能互動，經濟領域次之，而社會領域最低，而某些現實主義的論點，就暗示發動戰爭的能力是定義體系互動的關鍵。也就是說，現實主義所稱的體系，即是軍事—政治構成的體系。

¹⁴ Waltz (2002, 29-30) 雖然也有提及互動能力，不過他卻把交通、通訊和戰爭方式的互動能力改變化約成單元層次的變化，忽視技術所帶來互動能力的變化，對體系變遷的根本性影響。

另一方面，「權力」是現實主義的核心論述，不過其定義卻有諸多歧見。從Morgenthau發展到Mearsheimer，權力由控制力觀逐漸往物質屬性的「能力」（capabilities）轉變。不過作者認為權力與物質能力不能直接劃等號。權力的基礎確實來自於物質能力，但有必要把權力的定義回歸到控制能力，才能使權力在概念上具有實質意義，並且能進行理論操作。因為就連採取物質能力觀的Mearsheimer（2014, 40），亦以控制能力來定義霸權。意味著持有強大物質能力，並不等於取得霸權，可知物質性的「能力」概念在理論上的缺陷。因此，本文兼採Morgenthau（1973, 27-33）和Waltz（1979, 191-192）的觀點，以使他人為與不為的控制能力和相對影響力來界定「權力」。

二、體系的動態化：全球－區域雙層體系

全球一體的單一層次體系論，長期以來一直都是體系理論的主流。不僅是守勢現實主義，霸權穩定論、新自由主義，甚至是Wendt的社會建構論，皆採取單一層次的全球體系觀。雖然如權力轉移理論、英國學派，或是區域主義理論局部採用全球－區域雙層體系的看法，但它們卻沒有遵循結構現實主義的基本假定，這就使得隱然具有全球－區域雙層體系觀的攻勢現實主義顯得格外特別。可惜的是，攻勢理論並沒有完成全球－區域雙層體系的建構，更缺乏全球與區域如何互動的探討，有退回守勢理論，或淪為盲目擴張之嫌。

而為何必須在體系觀上採取全球－區域雙層體系，不能採取單層的國際體系呢？因為就連採取單一體系觀的Waltz（1979, 198-199）都承認，不同的國家對於不同的事務會有不同的關心。某些國家關心全球事務，其他國家卻僅關心區域事務。因此若將關心不同事務的國家放在同一層次進行檢視，理論的解釋力會受到很大限制。另一方面，由於單元、單元間互動和結構是體系的三大構成要件（Gilpin 1981, 25-38）。然而如同Buzan and Little（2000, 243-245, 276）所指出，由於互動能力不斷發展，國際關係已從過往的複合國際體系，發展為當前的全球－區域體系。若將時間在往前推移，Waltz理論立基的單元：現代國家，也是歷經數百年發展才完善的單元類型。也就是說，Waltz

認為單元和單元間互動特徵恆定不變的假定，並不準確。¹⁵而造成單元和單元間互動變化的物質性原因，關鍵就在「互動能力」的變遷。這些變遷甚至能改變體系／區域的分野和強大單元的影響範圍（Buzan and Little 2000, 80-84）。

三、結構的動態化：結構再調整

（一）體系結構二分：結構特徵定義結構

攻勢現實主義在承襲Waltz結構理論的同時，也繼承結構理論原有的靜態化缺點（Mearsheimer 2014, 17-22）。守勢現實主義的靜態性，正是來自於Waltz（1979, 108, 132-3）假定國際體系僅存有無政府狀態一種結構類型，而結構的變化並非在於排列規則和單元特質，而在於單元間的能力分配變化。是因為在討論單元間能力分配變化時，Waltz（1979, 88-101）只提出兩極和多極兩種類型，沒有說明為何忽略「單極」。¹⁶也就是說，結構理論在Waltz假定的限制之下，並不討論結構的類型轉換，成為只關注能力分配變化，且僅討論兩極和多極兩種能力分配的理論。¹⁷

另一方面，守勢現實主義也有將體系和結構混淆之虞。因為Waltz在提及兩極和多極結構時，總以體系稱之，然而從Waltz對體系和結構的定義來看，體系與結構實際上是不相同的概念。¹⁸Waltz所提的兩極和多極，事實上更屬於體系特徵，而非結構特徵。因為極數（*polartiy*）指的是體系內大國的數量（Buzan 2004, 4）。¹⁹也就是說，由於Waltz以體系特徵來定義結構，因此造成

¹⁵ Waltz理論的一個問題即在於把某個歷史階段國際關係的具體特徵，放大成為超時空的普遍特徵（Cox 1986, 213-214）。

¹⁶ 我們認為，Waltz之所以不討論單極的原因即在於要探討單極，則難以避免連帶討論霸權和層級狀態，而可能與其恆定無政府狀態的假定衝突。

¹⁷ 因此Hurrell（2006, 6）就認為結構現實主義係為僅關注能力分配的理論。

¹⁸ Waltz（1979, 9-81, 88-101）認為結構是體系的組成部分，有了結構，體系才不是簡單的集合體，而能被視為是一個整體。而在定義結構時，必須根據其排列規則（*ordering principles*）、單元特質（*character of the units*）以及能力分配（*distribution of capabilities*）來定義。

¹⁹ Morton Kaplan為最早以權力分配一極，來定義體系結構的學者之一（Wendt 1999, 97）。由於本文採取全球－區域體系，因此為求避免在中文表達上造成混淆，我們將以「極」／「極數國」來指稱全球大國，以「強」／「強國」來指稱區域大國。

其體系結構混同，將極數作為結構，使得結構現實主義成為僅探討極數變動的理論，無法更進一步探討結構對行為者的影響。²⁰所以必須將「能力分配」的定義回歸到Waltz本來使用的光譜二分法，以集中—分散，而非兩極—多極來區分。（如下表2所示，Waltz 1979, 114-116）。

表2 無政府狀態與層級狀態之比較

	無政府狀態	層級狀態
排列規則	平等	不平等
單元特質	相同	不相同
能力分配	分散	集中

資料來源：Waltz (1979).

（二）結構類型：無政府、層級和均勢

雖然Waltz認為層級狀態並不存於全球體系之中，所以拒絕無政府結構有轉換可能。然而Mearsheimer（2014, 17-22, 29-46）在提出區域霸權的同時，卻認為霸權可不再因全球無政府狀態而繼續追求改變現狀，這就涉及到結構理論原本沒有探討的「單極」和「層級狀態」（hierarchy）的概念。可惜攻勢現實主義並未就此進一步探討，僅點到為止，因此仍未突破Waltz的框架。但是因為攻勢理論提出了「全球—區域」雙層體系，為結構理論在區域體系中打開了探討無政府狀態以外結構類型的大門。畢竟許多重視「區域」的理論，傾向承認區域中存在著層級狀態（Huntington 1996; Buzan and Waever 2003）。²¹

²⁰ Waltz（1979, 129-131）認為，計算極數國的數量，必須綜合國家的物質能力來衡量，並且是經驗問題，依靠常識來判斷；Schweller（1998, 17, 85）則認為次要大國（lesser great powers, LGPs）要被視為極數國（pole），則必須擁有體系內最強國家一半以上的軍力；權力轉移理論則採較寬鬆的定義，僅稱大國達到第一強國相當比例的力量（唐欣偉 2016, 4）。從上可知，雖然極數是相當重要的理論概念，但度量卻仍然眾說紛紜。

²¹ 舉例來說，採取單層體系觀的理論，會咬定全體繫普遍的無政府狀態，因為沒有一個行為者能控制整個體系。但是若採全球—區域雙層體系，則由於有行為者能控制區域體系，因此在區域體系中，可以出現層級秩序。

我們主張結構理論可以結合Lake (2009) 和Mearsheimer (2014) 的看法，承認層級狀態在國際關係的存在。又因為全球體系有巨大的水體切割，層級狀態僅能形成於區域體系，全球體系仍處於無政府狀態。對於層級狀態，本文則結合Waltz和Mearsheimer結構理論的共同看法，將其定義為「體系內物質能力集中的行為者，履行體系內其他行為者所不能行使的功能。」此外，由於「全球－區域」雙層體系中，區域體系會受到來自於全球體系行為者干預的影響 (Tammen et al., 2000, 6-8; Buzan and Waever 2003, 16-18; Kelly 2007, 198)，原本處於無政府狀態的區域體系也可能產生出另一種新的結構類型，即均勢狀態 (balance of power)。均勢狀態有別於無政府和層級狀態，它是來自區域外的全球極數國因自身利益進行區域干涉，使本區域難以產生霸權並形成層級，卻造成區域內的均勢狀態。

(三) 結構對行為者的影響

結構的重要性，就在於其充當體系約束和支配的力量，改變行為者的行為，因而能藉由結構來解釋和預期行為者 (Waltz 1979, 65-78)。在過往，針對結構對行為者的影響，有守勢與攻勢的安全極大化 / 權力極大化之爭。本文認為，此爭點可以Waltz (1979, 126) 對位置 (position) 的看法來處理，也就是說，結構影響的是行為者對體系中所處之位置的偏好。藉由Mearsheimer (2014, 40-42) 對維持現狀和改變現狀的選擇來推論，可以得到三種情況：(1)結構為無政府狀態鼓勵行為者提升位置；(2)結構為層級狀態鼓勵維持位置；(3)結構為均勢狀態雖然同於無政府狀態，然由於有一域外全球行為者介入本區域發揮霸權作用，所以其在對行為者的影響則如同層級狀態，使行為者優先追求維持位置。

參、理論修正 (II)：全球與區域的雙層動態關係

上節以互動能力作為攻勢理論在本體論上的建構性因素，賦予體系和結構動態變遷之可能，從而解決單層體系觀恆定無政府狀態下的靜態化問題，也提出了一種全球－區域雙層體系的結構理論修正。不過結構理論各分支不是如同守勢理論般不探討區域體系，就是像攻勢理論那樣，輕視區域體系。其他學

派則是探討了區域體系，如英國學派、權力轉移理論或是區域主義，卻又不從結構理論與物質本體論出發。本文認為攻勢理論修正的三大重點，就是(1)加強結構現實主義在區域層次上的論證；(2)進一步探討全球層次國際政治的運作；(3)以及全球與區域雙層的互動關係。

一、區域層次：被結構性理論忽略的重點

結構現實主義不是如Waltz般忽略區域，就是如Mearsheimer般，僅將區域作為全球層次的理論客體，於是只重視全球單一層次，忽略「區域」的重要性（Buzan and Waever 2003, 27-30）。然而區域次體系是真實存在（reality），何況國際政治中，絕大多數的國家僅關注所屬區域的事務，僅有少數大國才是全球層次行動者。大國要彰顯其作用，無不致力於向所屬區域與其他區域投射權力，否則便無大國資格（Waltz 1979, 198-199; Buzan and Waever 2003, 14-20）。因此，任何結構性理論都不應忽略區域層次的作用，必須在理論分析上給予「區域」適當地位，否則就無法妥善解釋國際政治的運作與體系的變遷。所以本節將首先給予區域體系實質的內容，包括定義、極性、結構、運作和具體劃界。

（一）區域體系之定義

由於忽視區域體系，結構性理論沒有對區域詳盡探討。本研究借助Buzan and Waever（2003, 28-38, 43-45）的看法，仍以結構現實主義的觀點出發，將區域體系定義為：(1)一個小於但鑲嵌於全球體系之中，(2)由國家單元構成，具自身結構性特點（無政府、層級、權力平衡），(3)且互動能力（interaction capacity）受地理條件限制而足以與其他區域分合理切分的國際體系。區域體系內的大小單元由於高互動能力而關係更加密切，無法個別分割檢視任何單元關切的區域內安全問題。²²

²² 由於不若全球體系存在巨大水體障礙，在當前互動能力充足之下，區域體系除無政府狀態外亦可形成層級狀態，此外，亦由於全球層次對區域層次的影響，區域體系亦可形成均勢狀態。

(二) 極數國、區域極數和結構特徵

結構理論歷來重視理系的極數，即全球體系的「大國」數目，認為極數對戰爭與和平有重大影響，但是對於哪些國家是成「極」的「大國」，則訴諸常識，語焉不詳。本文依循結構理論的原理，將成極的大國稱為「極數國」，並將全球極數國定義為：「物質能力之規模足以控制所屬區域體系，從而有能力挑戰全球霸權的國家單元。」體系內的行為者一旦成為全球極數國，必為所屬區域次體系之最強國，此即Mearsheimer攻勢理論所稱的「區域霸主」。

其次，除了全球層次外，區域內的結構也有極數特徵。區域的極數和結構之關係如表3所示。在不受全球層次影響之下，僅有一區域極數國，該區域為單強體系，在本區形成層級（hierarchy）；若該區有兩個區域極數國，為兩強體系，形成無政府狀態；該區有三極數國以上或無極數國，則為多強體系，也是無政府狀態。但區域是鑲嵌在全球體系中，全球極數國必試圖干預區域區域，以求權力極大化。在全球體系必然干預區域下，區域的結構原型可能轉為變型。舉凡區域單強因外來的全球極數國施加制衡，無法轉變層級，僅能維持無政府狀態（如斯拉夫區域之俄羅斯，受北美的美國制衡）。區域兩強和多強體系，因其他區域之全球極數國介入，則從無政府變成均勢狀態（例如歐洲法德英，受北美的美國影響）。

表3 區域極數國數量與區域體系結構特徵

	沒有 區域極數國	一個 區域極數國	兩個 區域極數國	三個以上 區域極數國
區域極性	多強體系	單強體系	兩強體系	多強體系
結構原型	無政府狀態	層級狀態	無政府狀態	無政府狀態
域外干預下 區域結構變型	不變形*	無政府狀態	均勢	均勢

說明：即使全球極數國對區域次體系沒有強國的地方進行干預，除非創造出新的區域極數，否則仍無法改變該區之無政府狀態，所以結果為不變形。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三) 區域體系之運作

若區域體系不受全球層次影響，其運作當與全球體系無所差別（Tammen et al. 2000, 69-70）。然而從攻勢理論的角度來看，區域次體系的運作還是有些不同於全球層次，因為攻勢理論相信區域能產生霸權，全球則受制於地理因素，不能產生全球霸主。²³此外，雖然任何區域體系都從無政府狀態開始發展，各單元競相追求提升自身在區域內的位置，這看似與全球層次相同，然而若區域體系出現霸權時，除非有域外強大奧援介入，否則會迫使該區所有中小單元不再追求改變現狀，而改向霸主「扈從」。²⁴

國際政治的歷史則顯示，每個區域體系都有自身的地理與歷史特色。有些區域可能因為地緣政治與歷史因素，形成穩定不變的霸權國與層級秩序。也就是說，在某些區域（例如北美、斯拉夫、東亞），很容易產生區域霸權，使之自動晉升全球極數國。另一方面，由於區域之間的「互動能力」隨全球化日益加強，區域極數與秩序結構會受到全球層次的影響，因此使得區域體系的運作有別於全球體系，因為全球體系仍是無上位層次的封閉體系（Tammen et al. 2000, 6-8; Buzan and Waever 2003, 16-18; Prys 2010, 496）。

(四) 區域劃界

攻勢現實主義雖提出地理因素與「區域霸權」等重要創新概念，卻未能開發一套具體明確的區域劃界判準，使其區域論述多有重疊模糊之處，難以在區域層次進行理論操作，讓人誤以為區域的國際政治與Waltz的單層體系有相同的規律，或者地理只是單元屬性，這是嚴重的理論缺口（張登及 2009, 6-18; Toft 2005, 393）。作者結合論證過地理因素的文明衝突論、Buzan和Waever的區域安全分析，與Saul B. Cohen的地緣政治學，提出一項區域劃界判準。根據各家學說，巨大地理障礙和單元互動集中度是較有交集的世界分區依據，也與

²³ 而如果說全球體系因互動能力不足，無法跨越地理障礙形成霸權，那事實上，對於某些區域體系來說，亦可能如此。這也是某些區域體系在過去有產生霸權，而某些未曾的科技性因素。

²⁴ 也就是說，成為霸權的關鍵就在於是否控制體系。因此即使某些體系內最強國，超越體系內次強國甚多，如果仍未能掌控體系，亦並非霸權，如同當前的澳大利亞之於東南亞暨南太平洋、巴西之於南美。

Buzan理論的互動能力地理觀呼應。因此筆者認為在劃界判準上，首先可以巨大地理障礙進行粗略劃界，再進而以上述文獻的劃界成果為輔，評估單元間互動程度來確認分區（Huntington 1996, 40-49; Buzan and Waever 2003, 43-52; Cohen 2009; Mearsheimer 2014, 40-42, 83-84, 114-128, 144-145, 264-266, 360-363）。

從巨大地理障礙來看，可用大洋、山脈、廣闊沙漠等地理阻隔，將整個國際體系先分為美洲、亞洲、歐洲、非洲和大洋洲。美洲部分，本研究採用Cohen（2009）的劃界，以中美洲地峽，將其區分為「北美洲暨中美洲」與「南美洲」兩區。²⁵在歐洲和非洲劃界則根據Huntington（1996）的看法，將撒哈沙漠以南的非洲歸為「非洲」，²⁶以北則參考宗教與文化整體性，併入西亞劃分為「伊斯蘭」。²⁷歐洲部分也依據地緣政治與宗教，分為「歐洲」和「斯拉夫」。²⁸在亞洲以及大洋洲，則綜合Buzan and Waever（2003）、Cohen（2009）與Huntington（1996）的看法，分為「南亞」、「東亞」和「南太平洋」。²⁹整個全球體系依此劃分為九個區域次體系（圖1）。但這並不是主張體系間的界線涇渭分明，區域界線可能因互動能力變化和大國角力有所變動。區域之間往往是極數國較量激烈的地區，Huntington（1996, 41-43）曾稱為斷

²⁵ 本研究將南北美洲分離，以及將中美洲劃入北美洲的其中一個關鍵原因，即在於美國長期以來對中美洲的干預，明顯有別於南美洲，也就是說，北美洲與中美洲體系的行為者互動頻繁、安全互賴。Cohen（2009, 135-138, 147-148）即指出美國在成為區域霸權之前就開始干預中美洲事務，而南美洲則是由於地理因素阻礙了美國對南美的控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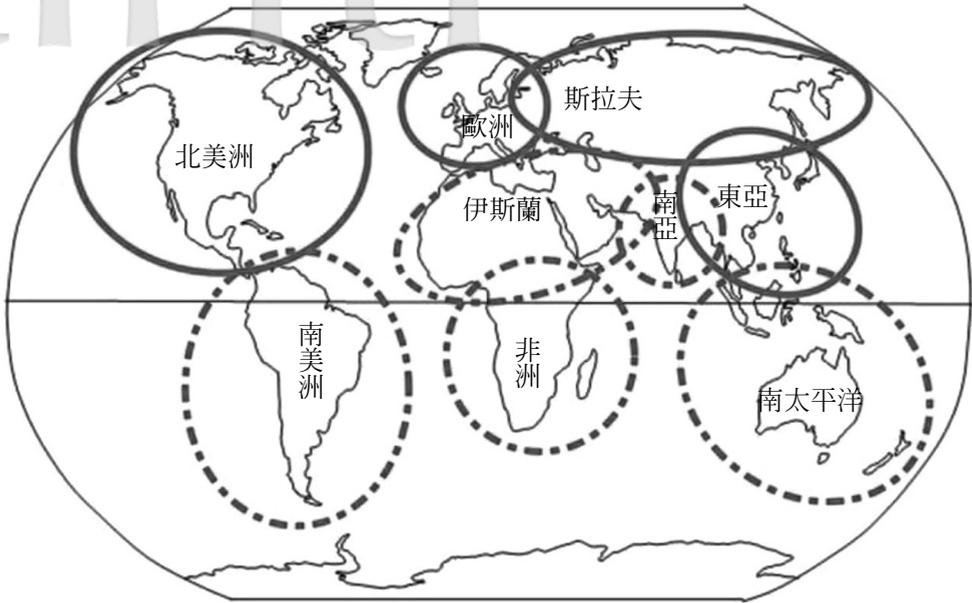
²⁶ Cohen（2009, 409-410）亦將撒哈拉以南的非洲視作一區域體系，不過更進一步將其區分出5個亞區：東非、西非、中非、南非和非洲之角。

²⁷ Huntington以信奉伊斯蘭教與否為主要判準劃分非洲。本研究雖然不採取觀念因素，不過事實上，宗教、文化的傳播也與互動能力有關聯，因此本研究認為，在非洲，伊斯蘭教的傳播大致止於撒哈拉沙漠南端，並非巧合。

²⁸ 斯拉夫與歐洲之間的界線在東歐、波羅地海和巴爾幹半島的部分事實上有所重疊，而會在不同時期向東或向西推移。

²⁹ 雖然Buzan和Waever將中亞劃入東亞，不過Cohen和Huntington則分別將其劃入俄羅斯與歐亞大陸匯合區及希臘正教文明。筆者則採用後兩者的看法，將中亞劃入斯拉夫體系。因為在實際互動來說，以往中亞與俄羅斯甚至是烏克蘭的互動要多於東亞國家。另一方面，Buzan和Waever將中南半島和南太平洋同劃於東南亞，Cohen則同劃於亞太沿岸，筆者則大致以中南半島為界，以北為東亞，以南為南太平洋。

圖1 當前區域體系劃界



說明：實線區域為20世紀後曾出現霸權的區域體系；虛線則為未曾出現霸權的體系。

資料來源：作者修正繪製，原圖來源見<https://goo.gl/B2kVHe>。

層線，也是下圖的區域重疊區。³⁰

二、全球層次的運作邏輯：極數國定理

根據Buzan and Little (2000, 239, 243-245, 279) 的分析，當代全球體系是由多個歷史複合體系發展而成的一個上位封閉體系，封閉性即意味世界上所有國家都無法置身於全球層次的影響之外，所以讓全球層次變得極為重要，在探討國際關係時必須檢視全球層次。而探討個別區域關係除檢視區域層次外，也須探討全球層次對區域的影響 (Prys 2010, 479-504)。依照對攻勢理論的修正成果，以下將分析全球層次的基礎、運行，及對區域層次的干預現象。

(一) 全球層次與全球極數國

結構理論多僅關注全球層次權力競逐。雖然在其他國關理論中，有些研究

³⁰ 區域重疊交界之處，本研究認同Huntington (1996, 125) 斷層線的看法，易發生衝突。

者會關注全球對區域層次的影響，不過卻少有學者反過來指出區域對全球層次的影響，仍侷限於只有上對下的單向分析。

作者同意Buzan and Waever (2003, 84-86) 的看法，認為全球體系的層次並非憑空而生，而係基於區域層次變遷而來。也就是說，全球層次的基礎在於區域層次，因為每一個全球行為者必先是區域行為者，才能由於某些原因，晉升到全球層次。晉升的關鍵則依照Mearsheimer (2014) 的原始主張，在於該單元成為區域的霸權。³¹因為只有區域霸權的位置，才能讓單元不擔心來自本區的威脅，得以將權力投射到域外甚至全球層次上。所以顯然只有區域霸權才能成為完整的全球體系行為者，即「全球極數國」。³²在沒有成為區域霸權前，區域行為者將受限於本區域內威脅而無法他顧。這種中小單元（例如新加坡、以色列、波蘭、越南、韓國），即使關心全球事務，也僅限於那些會影響到自身區域安全的特定域外事務，其根源仍出自於區域安全，而非追求全球層次權力極大化。

（二）全球層次的運作邏輯：極數國定理

全球層次的運作與區域大不相同的原因在於三點：(1)全球體系是封閉的上位體系，結構特徵為無政府狀態；(2)全球體系因地理因素限制導致互動能力受限，無法形成全球霸主與層級狀態；(3)全球體系為區域體系的上位體系，可對區域進行干預。基於這三點和前節對攻勢理論的修正，可推導出全球層次的五項國際政治運作模式，我們稱之為「極數國定理」：

第一定理：位置競爭。由於全球體系恆定為無政府狀態，全球極數國必競相追求權力極大化以提升位置。

第二定理：全球衝突。全球極數國為追求提升位置，必會因相互競逐權力而彼此制衡，導致衝突。全球極數國的行為不存在扞從選項。

第三定理：區域干預。全球極數國必干預其他區域，以圖影響該區域的極

³¹ Prys (2010, 484) 指出區域霸權是相當重要的概念，因為藉由探討區域霸權，才能理解國家如何與其區域和全球層次連結。本研究則更進一步將區域霸權界定為區域行為者進入全球層次的資格門檻，也就是說，僅有區域霸權同時為全球和區域行為者，連結兩層次的互動。

³² 區域霸權同時亦為全球極數國，為國際體系的潛在霸主。

數或結構，其目的是避免該區域出現區域霸權，晉升成為新的全球極數國。

第四定理：區域衝突。全球極數國除在全球層次與其他極數國競逐，亦會在區域層次與其他全球極數國競逐。

第五定理：權宜合作。全球極數國在與其他極數國競逐全球位置的同時，亦可能卸責或權宜合作，以圖削弱對手或第三國，減少全球極數國競爭者。

(三) 全球極數國干預區域的邏輯

攻勢現實主義對全球層次競爭有相當詳盡的探討，我們此處僅需討論全球極數國干預區域的傾向。承前第三、第四、第五定理，全球極數國有干預區域的利益，其情境可分為(1)全球情勢或(2)區域情勢。前者導致的干預行動，目的係為提升自身全球位置或削弱其他全球極數國；後者導致的干預行動則是為避免某一區域出現新的全球極數國，而對該區域進行干預。在不同的全球極數態勢下，全球情勢和區域情勢的重要性各有不同，如表4。

表4 全球極數對全球極數國區域干預邏輯之比較

	全球情勢重要性	區域情勢重要性
(1)全球多極	較重要	較不重要
(2)全球兩極	較不重要	較重要
(3)全球單極	毫不重要	極為重要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全球極數造成全球情勢或區域情勢重要性不同，原因在於極數變化雖然不會影響結構，但卻會影響全球極數國之間的互動策略。這些策略選擇的邏輯分析可分為四點：

(1)多極體系。由於全球極數國數量眾多，全球行為者有更多機會藉由增減全球極數國數量改善自身位置，重點策略是全球合縱連橫。例如二戰時美國支持英國，日本支持德國。

(2)兩極體系。由於僅存兩個極數國，增加全球極數國數量對雙方成本都非常大，兩大強權必全力阻止新極數國出現。例如冷戰時期蘇聯撤廢對中共的

技術支持，美國則藉由廣場協議削弱日本崛起。

(3)單極體系。則由於全球競逐消弭，唯一的區域霸權必全力防阻潛在極數國在其他區域出現。例如小布希（George W. Bush）將北京視為戰略競爭者（strategic competitor）、歐巴馬（Barrack Obama）對華「再平衡」（rebalancing）、川普政府推動「印太」（Indo-Pacific）戰略。

(4)地理因素。在不同的全球極性中，由於地理因素與增減極數國的成本限制，會使得全球極數國對干預多個區域，必須區分輕重緩急。³³

此外，出自於追求提升全球位置的結構性因素，全球極數國對區域極數結構也會有不同偏好。簡言之，區域越難出現單強的層級結構，就越難出現新的全球極數國，這種情形就越受既有的全球極數國所偏好。因此全球極數國在對其他區域的極數，依序偏好為多強、兩強、單強；在結構上，依序偏好均勢、無政府狀態、層級體系。加上地理遠近，和前述的全球－區域情勢重要性，共同決定全球極數國對區域干預的策略。

不過由於區域極性結構轉換的變化，不可能跳脫出體系結構自身之規則，因此除前述之體系極數結構轉換之通常規則外，亦須考慮到結構形成、極性轉換和結構轉換本身的特點，可簡述如下：

1. 結構形成：僅區域單強能形成該區域的層級狀態；僅區域兩強或多強能形成均勢。由於全球多極體系容易發生誤判和衝突（Waltz 1979, 161-176; Mearsheimer 2014, 334-347），因此無法在特定區域保持均勢狀態。

2. 極數轉換：區域多強無法直接轉為單強而須先歷經兩強，即使期間為時甚短。區域單強只有在本區原極數國因戰敗或沒落喪失資格時，才可能直接從單強轉為多強。

3. 結構轉換：層級狀態與均勢僅能從無政府狀態轉換，兩者之間無法直接轉換，即使為時甚短。

總結極數國定理與極數國干預區域的邏輯，本文以不同全球極數下，全球極數國對不同區域進行干預的可能結果，整理如下表5。

³³ 例如由於本研究認為全球極數國的物質基礎在於區域體系，只有區域霸權才能成為全球極數國，因此在全球單極下，該全球極數國即為唯一的區域霸主，全球層次因素對該單極區域之影響為「無」。

表5 全球極數國在不同體系結構(極數)下干預區域可能導致結果列表*

體系結構 原型	區域單強		區域兩強		區域多強	
	層級狀態	無政府狀態	無政府狀態	無政府狀態	無政府狀態	無政府狀態
全球多極 無政府狀態	維持單強層級(罕)** 轉變單強無政府 轉變兩強無政府 轉變多強無政府	維持單強無政府 轉變單強層級 轉變兩強無政府 轉變多強無政府	維持兩強無政府 轉變多強無政府 轉變單強層級	維持兩強均勢 轉變兩強無政府 轉變多強無政府 轉變單強層級(罕) 轉變單強無政府(罕)	維持多強無政府 轉變兩強無政府	維持多強均勢 轉變多強無政府 轉變兩強無政府
全球兩極 無政府狀態	維持單強層級(罕) 轉變單強無政府 轉變兩強無政府 轉變多強無政府	維持單強無政府 轉變單強層級(罕) 轉變兩強無政府 轉變多強無政府	無政府狀態 維持兩強無政府 轉變兩強均勢 轉變多強無政府 轉變單強層級(罕) 轉變單強無政府(罕)	均勢狀態 維持兩強均勢 轉變兩強無政府 轉變多強無政府 轉變單強層級(罕) 轉變單強無政府(罕)	無政府狀態 維持多強無政府 轉變多強均勢 轉變兩強無政府	均勢狀態 維持多強均勢 轉變多強無政府 轉變兩強無政府
全球單極 無政府狀態	無影響 維持單強無政府 轉變單強層級(罕) 轉變兩強無政府 轉變多強無政府	維持單強無政府 轉變單強層級(罕) 轉變兩強無政府 轉變多強無政府	維持兩強無政府 轉變兩強均勢 轉變多強無政府 轉變單強層級(罕) 轉變單強無政府(罕)	維持兩強均勢 轉變兩強無政府(罕) 轉變多強無政府 轉變單強層級(罕) 轉變單強無政府(罕)	維持多強無政府 轉變多強均勢 轉變兩強無政府(罕) 轉變兩強無政府(罕)	維持多強均勢 轉變多強無政府(罕) 轉變兩強無政府(罕)

* 說明：本研究並不主張全球極數國必然能成功干預區域，使其發展為自身所期望的極數結構。這可能由於許多原因：(1)全球極數國之能力不足；(2)有其他全球極數國干預；(3)區域自身因素。本表窮盡全球體系對區域體系之影響，案例研究限於篇幅，僅討論不同全球極數對區域兩強體系之影響，即中間兩欄框列部分。

** 說明：「罕見」並非指涉其發生次數，而係指涉條件滿足之難度，也就是說，必須在滿足特定的條件之下才可能發生，若不滿足，則此結果不可能發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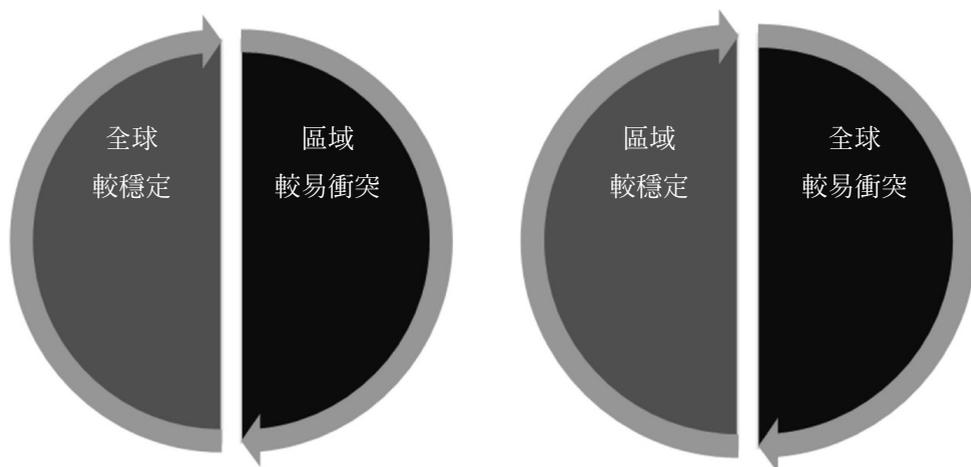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三、全球競爭與區域干涉的悲劇

本節先後探討了區域層次和全球層次的運作。不僅全球極數國會干預區域層次，區域層次情勢亦對全球層次有所影響，即構成全球極數。因此在這樣的雙層辯證關係下，根據Waltz（1979, 161-176）和Mearsheimer（2014, 334-347）認為全球極數越少全球層次會較穩定的看法，即會形成全球競爭與區域干涉的悲劇。因為當全球極數越少，就意味多數區域沒有霸權，而全球極數國更容易干預該等區域內之競爭與衝突。當多數區域各擁霸權，雖然這些區域會形成層級而較為穩定，但由於全球極數的增加，就使得全球層次更容易因不穩定的聯盟關係而發生衝突。

總之，當全球較穩定，區域即較可能發生衝突；而當區域較穩定，則全球層次較可能發生衝突。本文最終透過攻勢理論的修正，印證古典現實主義大師Morgenthau（1973, 27-28）的看法：國際政治永遠充滿權力鬥爭，形成全球競爭與區域干涉相互循環的悲劇。

圖2 全球與區域情勢連動關係圖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肆、案例分析：全球多極、兩極和單極對東亞之干預

本節探討不同全球極數下全球極數國對區域的干預變化，而分別以戰間期、冷戰和後冷戰時期的東亞，作為實際案例，驗證本研究提出的理論修正。³⁴由於篇幅有限，因此在全球多極案例中，本研究將著重在探討東亞從單強層級轉為兩強無政府的全球影響。在全球兩極案例中，本研究將著重在探討東亞從兩強無政府轉為兩強均勢的全球影響。在全球單極案例中，本研究將著重在探討東亞從兩強均勢，轉變為兩強無政府，以及美國對東亞制衡對象的變化。

一、全球多極對東亞之干預

（一）體系格局：全球多極

本時期座落於戰間期至二戰，單元互動能力變化劇烈（Tammen et al. 2000, 64-68）。戰前，坦克和飛機尚未改變戰爭樣貌（Hobsbawm 1996, 28-29）。³⁵所以此時期的體系格局亦與冷戰體系有所不同。³⁶在全球極數部分，一戰結束後，美國、英國與日本為北美、不列顛群島和東亞的霸權；蘇聯則在1917~1922年的內戰結束後，成為斯拉夫霸權（林添貴 2003, 38-55）；德國則於1940年擊敗法國後，逐步成為歐陸霸權。不過德英在此時期亦因全球層次干預、戰敗和體系變化，分別失去全球極數國資格。因此雖然時有變動，但此時全球體系處於多極。

自東亞朝貢體系瓦解，日本崛起以降，近代東亞轉為中、日兩強無政府體

³⁴ 以東亞作為案例對象的原因在於，東亞在二十世紀中，歷經從單強層級狀態轉變為兩強無政府狀態、兩強均勢狀態，最後又再轉變為無政府狀態，且極數變動較為穩定，因此更能看出全球極數國在不同時期採取不同干預策略背後的脈絡。

³⁵ 從某些現實主義的觀點來看，發動戰爭的能力是定義體系的關鍵因素（Buzan and Little 2000, 80-84）。

³⁶ 本研究認為，此時期與當前世界最主要的面貌不同，在於不列顛群島（British Isles）仍獨立於歐陸，作為獨立區域體系，直至二戰爆發後，才逐漸與歐陸體系融合成歐洲體系。另一方面，日本列島（Japanese archipelago）卻不同於不列顛群島體系，由於日本在1895年以降逐步控制台灣、朝鮮半島以及中國東北，使得原本可能成為獨立區域的日本列島，融入於東亞區域體系之中。

系。在此期間，由於中國陷入軍閥混戰，以及國際爆發第一次世界大戰、帝俄瓦解，過往干預東亞的西歐極數國影響一度消失，日本即藉此契機，先於1915年逼迫袁世凱政府同意《二十一條》大部條款，再於1917年與美國簽署《藍辛—石井協定》，使東亞區域逐漸轉為層級體系，成為區域霸主，並企圖確立全球極數國之位置。

（二）假設

在全球多極，東亞單強層級的情況，從表5推論，全球極數國對東亞之干預，有(1)維持單強層級、(2)轉變為單強無政府、(3)轉變為東亞兩強無政府和(4)轉變為東亞多強無政府等四種選項。

從地理位置和全球情勢來看全球極數國的策略，位置相鄰的美、蘇有更多避免日本成為東亞霸主的利益。位置遙遠的英、德兩強則關心較少。全球位置優勢最明確的美國，有最多利益阻止日本成為東亞區域霸權，全球位置劣勢的英、俄、德，制衡日本的能力與意願則較少。

（三）極數國策略：轉變與維持東亞兩強無政府

從地理位置和體系格局來看，美、蘇係最有動機破壞日本東亞霸主地位的全球極數國。當中國因內戰四分五裂，全球行為者因世界大戰無暇東顧，讓日本成為區域霸權時，美國在一戰後即率先與英國聯手組建國際對華借款團，試圖削弱日本對中國的影響（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問題研究所 1980, 470-473；周永生 2012e, 87-88）。美國更在1921年8月透過華盛頓會議，限制日本海軍發展，廢除英日同盟，確立門戶開放原則，減弱日本在中國的優越地位（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問題研究所 1980, 470-473）。

另一方面，除阻止日本提升位置，全球極數國也藉由扶持中國，提升中國之區域位置，以轉變東亞兩強無政府的結構。舉例來說，從政治面來看，蘇聯從1921年開始即與國民政府合作，協助其北伐，以結束軍閥混戰。從經濟面來看，1925年10月美英即不顧日本反對，同意中國提高關稅，甚至還在1928年7月時讓中國恢復關稅自主，從而使中國終結長期以來的財政桎梏，全力復興經濟。

中原大戰後，中華民國表面歸於統一，結合前述全球影響，正式結束日本區域獨霸地位。這也讓日本展開制衡南京之措施，從1928年5月的濟南事件，

到1931年九一八事變和1932年的一二八事變，都屬於削弱中國恢復區域強國的選擇。與此同時，蘇聯雖然由於德國崛起，為避免兩面受敵，在九一八事變中對日採取中立，但卻也轉換過去敵視南京的態度，於1932年底與國民政府復交（沈志華 2007, 46-49）。在西安事變中更保護蔣介石，批評中共妨礙抗日團結，促成國共統一戰線（沈志華 2007, 54-58; Rich 2003, 136-137）。另一方面，由於注意到美日關係緊張，因此蘇聯在1933年5月亦主動將引起兩國長年紛爭的中東鐵路賣給日本，以減少衝突可能（沈志華 2007, 49; Rich 2003, 128-129）。也就是說，蘇聯玩起兩手策略，卸責中國，不願直接抗衡日本。

對比於蘇聯，美國在九一八事變中僅發表史汀生主義（Stinson Doctrine）來譴責日本，並未有具體措施，在一二八事變中，亦僅協助參與中日雙方的停戰談判。有學者便認為美國之所以不願對日本採取強硬措施的原因，就在於以日制蘇的需求（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問題研究所 1980, 560-564; Rich 2003, 128-129）。當1937年7月中日全面開戰後，僅有蘇聯給予中國實質援助，於8月簽訂《蘇中互助條約》，斷絕與日本的貿易往來，並派出大量顧問人員協助重慶（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問題研究所 1980, 625; 沈志華 2007, 59-62），甚至還在1939年5至8月間與日本爆發諾門罕衝突。當時美國在一邊發布無關痛癢的抗議和照會，另一邊還繼續對日輸出戰略資源，拒絕另一極數國英國提議共同對日施加壓力、制止其南進星、馬（Keylor 2006, 215-216; Rich 2003, 136-137, 141-142）。美國此時的選擇符合定理第五項：權宜合作。

不過當中國在戰場上不斷失利，有戰敗投降可能，日本往西南太平洋擴張的作戰勢如破竹，可能成為霸權時，美國就必須改變過去卸責英蘇、拉日制蘇的權宜政策，進入極數國第三、第四定理的日美衝突想定。首先，美國於1939年7月取消與日本之間的商約；在1940年9月日法印支戰爭開始後，美國更以禁運廢鐵回應，而英國亦重啓緬甸公路，將物資運送至中國，開始聯中制日（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問題研究所 1980, 657-658）。日本於1941年7月完全佔領中南半島後，美國也對日本展開經濟制裁，凍結其在美資產、施行貿易禁運，要求日本撤出中國，並開始為重慶提供更多的經濟和軍事援助，象徵全球極數國美國決定性改變東亞的政策，全力制衡日本。這也使日本沒有選擇，要確保東亞霸主與全球極數國位置，勢必要與前來干預的美國一決雌雄，遂於

當年12月先發制人，偷襲珍珠港（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問題研究所 1980, 670; Kissinger 1994, 392-393; Keylor 2006, 216-219; Rich 2003, 238-239）。³⁷

戰間期至二戰的東亞，美蘇兩大全球極數國因為地理位置與東亞接近，在對日態度上較為強硬。由於全球情勢變遷，使得有水體屏障的美國可先卸責日本，以達制衡蘇聯的目的。根據極數國定理，這絕非表示美國樂見日本成為東亞霸主，因此當中國可能戰敗、日本轉向南進，擴張至南亞次體系時，美國必須聯手另一極數國英國來反制，最終與日本爆發戰爭。蘇聯由於地理相鄰，自始就最為積極地扶持重慶、制衡東京以維持東亞兩強無政府，甚至與日本發生軍事衝突。直至德國打敗法國確立為西歐極數國後，蘇聯無力東顧，暫時放棄對東亞積極干預。較晚成為全球極數國且地理位置遙遠的德國，則希望支持日本成為東亞霸主以牽制其他全球極數國，符合定理第五項：權宜合作。

二、全球兩極對東亞之干預

（一）體系格局：全球兩極

二戰結束，很快進入全球冷戰時期，國際體系從多極變為兩極，僅有美蘇兩個區域霸權具有全球極數國位置。由於通訊與交通技術進步、單元互動能力空前提升，體系格局再次發生了重大改變。歐陸體系的東歐由於蘇聯崛起與華沙公約，大部分被併入斯拉夫體系，其餘的西歐各國在北約與歐洲共同市場作用下，與不列顛體系融合成歐洲體系。戰後西歐殘破，除德國戰敗之外，英法亦屬慘勝，需要美國保護，英、法、德雖然名義上仍是政治或經濟大國，其實都已經喪失全球極數國地位。此後中國內戰中共大部勝出，復支援北韓與北越對抗域外極數國介入，其東亞大國地位在1954年日內瓦會議獲得確認（張登及 2003, 46; Judt 2005, 749-750）。日本也在舊金山和約後逃免戰敗分割命運，轉而分擔美國介入東亞、制衡蘇聯的責任，藉由經濟振興，重回區域大國地位。但日、中分屬不同陣營，東亞遂重現中、日兩強無政府格局。

³⁷ 另一方面，蘇聯卻由於與德國的衝突，選擇放棄過往援助中國的策略，於1941年4月與日本簽訂中立條約，避免背腹受敵（沈志華 2007, 69-71; Keylor 2006, 219-220; Rich 2003, 242-243）。

(二) 假設

在全球兩極冷戰，東亞兩強無政府的情況，依據表5推論，全球極數國對東亞之干預有五項策略選擇：(1)維持兩強無政府、(2)造成兩強均勢、(3)造成多強無政府，以及(4)支持東亞單強層級或(5)轉變單強無政府。

而從地理位置和全球情勢來看，美蘇由於鄰近，皆有阻止東亞出現單強霸權的利益。雖然美蘇皆有避免東亞出現霸權的利益，維持全球兩極格局，然而中、日兩強亦可以藉由聯盟轉換或振興經濟來改變東亞情勢，打擊域外干預者之全球位置，力圖使自己晉升全球極數國。

(三) 極數國策略 (I)：維持東亞兩強無政府

二戰後直至日本於舊金山和約後重新獨立和中共建政，東亞才得以結束過渡期，形成兩強無政府體系。初期，由於共軍在韓戰中抗衡美國的軍事表現，因此國勢大幅提升；相較於此，日本僅有小規模軍隊（Kissinger 2011, 146-147; Keylor 2006, 331-333）。而針對中強日弱的區域情勢，美國不僅積極扶持日本的經濟發展，亦拉攏北京周邊國家形成島鏈，防阻北京提升位置。

蘇聯方面，史達林（Joseph Stalin）對毛澤東執政有所保留，僅給予北京有限度的信任和援助。赫魯雪夫（Nikita Khrushchev）上台後，一度增加對華的援助。不過對蘇聯來說，中共成爲東亞霸權將不利於其全球位置，因此自1958年開始，中蘇即因長波電台、聯合艦隊和金門炮戰開始摩擦，使得蘇聯進而在1960年7月時全面撤回技術人員，拒絕協助中共取得核武。蘇聯甚至在1961年8月破天荒請求美國一同阻止中共取得原子彈，顯見蘇聯此時已從扶持中共制衡美國，轉而變成避免其坐大。最終，中蘇因意識形態與現實利益雙重衝突，兩國關係徹底破裂。與此同時，美國則加強與日韓台的軍事同盟關係，繼續採取制衡中共的策略（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問題研究所 1980, 823-824; 沈志華 2007, 284-298）。華府不僅在中共於1964年試爆原子彈成功後擴大對日本經濟和軍事援助，甚至還迫使日本放棄與北京和解的嘗試（周永生 2012c, 208-210, 214-220）。³⁸

³⁸ 美國國務院在1964年的文件中也提到對於日本經濟高速成長的擔憂（周永生 2012a, 326）。

冷戰之初，雖然蘇聯初始選擇扶持中共成為東亞兩強以牽制美國，然而當中共國力復甦，甚至欲圖發展核武，企圖成為東亞獨強時，蘇聯即轉而制衡，以維持兩強無政府。美國此時在東亞則優先採制衡北京、扶持東京以牽制蘇、中，維持東亞兩強無政府。

（四）極數國策略（II）：塑造東亞兩強均勢

由於蘇聯在1966年與蒙古結為軍事同盟，在1968年高舉布里茲涅夫主義（Brezhnev Doctrine）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使得中共開始將莫斯科而非華府視為最大威脅（沈志華 2007, 347, 366, 376-387; 謝益顯 2009, 183-187, 191-195; Keylor 2006, 336-337, 345-346; Rich 2003, 445-456）。中蘇兩國的邊境衝突亦逐步升級，最終在1969年分別於珍寶島及新疆邊界發生軍事衝突，使得毛澤東決定與美國和解。與此同時，美國力圖從越戰之區域干涉失利脫身，也需要利用中蘇矛盾，分擔制衡蘇聯壓力。因此尼克森總統（Richard Nixon）便於1972年2月訪問北京，改變冷戰初期奉行的東亞區域聯日制中政策（張雲雷 2014, 219; Keylor 2006, 336-337, 348-351; Rich 2003, 448-451）。

美國一反過往強化日、中無政府對抗，轉而塑造中日均勢，除了是要制衡全球極國蘇聯在東歐、東南亞的強勁攻勢外，亦與日本國力高速成長、地位可能晉升有關。文獻指出，季辛吉（Henry Kissinger）在1971年10月訪華時向周恩來表示，自己並不認為當日本強大的時候，還會服從美國，所以除了對日本展開經貿制衡，美國也開始協助北京發展經濟（張雲雷 2014, 215-217; 周永生 2012d, 234; Friedberg 2011, 74-75; Keylor 2006, 394-395）。因為此時日本已成為世界第三大經濟體，未來非常有可能超越蘇聯，晉升世界第二經濟強權，讓美國不得不有所預防。

美國調動東亞區域的日中關係情況下，蘇聯開始試圖拉攏日本（吳萬虹 2013a, 109-112）。不過由於領土問題、蘇聯成立太平洋艦隊，及蘇聯要求日本放棄美日安保條約，其拉攏未見成效。且更由於蘇聯在1976年重新對外擴張，在北方四島建設軍事基地、頻繁出沒在日本外海，以及扶持越南、入侵阿富汗，對中共形成南北夾擊，迫使中、日兩國進一步向美國靠攏。在美國促使下，北京和東京於1978年8月簽署《中日和平友好條約》，美方隨後亦於1979年1月與北京建立正式關係（吳萬虹 2013a, 116-118, 130; 張雲雷 2014, 216; 周

永生 2012d, 247)。也就是說，由於美國經濟與軍事顯現疲態，而蘇聯同時威脅中日兩國，美國在東亞選擇塑造日、中兩強均勢，使東京與北京互相採取維持位置、共抗蘇聯的守勢態勢。³⁹

三、全球單極對東亞之干預

(一) 體系格局

進入後冷戰時期，美國為僅存的全球極數國。由於蘇聯瓦解，過往因蘇聯強盛被併入斯拉夫體系的歐洲東部，則逐漸回歸於歐洲次體系之中。波羅的海、烏克蘭、高加索一線，則成為歐洲與俄國競爭的勢力重疊區。

(二) 假設

冷戰末期東亞逐漸進入全球單極，東亞兩強均勢。根據表5，冷戰結束後，唯一全球極數國美國對東亞之干預策略計有(1)維持兩強均勢、(2)塑造兩強無政府、(3)塑造多強無政府、(4)塑造單強無政府，或(5)塑造單強層級秩序等選項。若中、日兩強變成無政府競爭關係，美方有維持兩強無政府、轉變兩強均勢、多強無政府，以及轉為支持單強層級和單強無政府的選項。

(三) 極數國策略 (I)：營造維持東亞兩強無政府

由於過往建構東亞兩強均勢的全球因素—蘇聯威脅消失，這即不可避免地使東亞的體系結構發生轉變。首先，因為日本在80年代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有所忌憚，開始對其展現防禦姿態，迫使日本在經貿上接連做出讓步 (Waltz 2008, 176)。⁴⁰也由於日本之增長優勢原本高於中共，因此在以中制日、以中制蘇、避免破壞東亞兩強均勢體系的考量下，因天安門事件而制裁中共的美國即很快取消制裁，甚至還開始試圖與中共發展建設性關係 (謝益顯 2009, 357-360; 王緝思 2016, 27; Brzezinski 2007, 55; Kissinger 2011, 411-428)。

³⁹ 由於蘇聯威脅提升，使得中共一改1970年初期反對美日安保條約的態度，認同美日藉由該方針建立實質軍事結構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2002b, 9)。

⁴⁰ 因此80年代美國的學術界和社會也相當流行「日本威脅論」和「敲打日本」 (王輯思、徐輝、倪峰 2007, 95, 209-211; 周永生 2012b, 275-276; 吳萬虹 2013c, 167-168)。

1995至1996的台海危機爆發之後，美國轉而開始考慮制衡中共，並且一改此前對日本的壓制（王緝思 2012, 199-201; 吳萬虹 2013b, 228-229; 張登及 2008, 119），增加與日安全合作，消除過往貿易摩擦，戰略上明顯針對北京（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2002a, 102-106）。雖從1997年美國批評並阻止日本應對亞洲金融危機即可明白，此時美國仍對日本持有戒心（王緝思、徐輝、倪峰 2007, 217-220;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 2002c, 133-134）。但從北京在台海危機後將其軍費支出提升一倍，及日本積極與美國協同防範中國未來晉升全球極數國可以理解，東亞已從均勢狀態逐漸轉變為兩強無政府狀態（Nye 2002, 20-21）。

（四）極數國策略（II）：維持兩強無政府

台海危機並非是美國徹底制衡中共的轉捩點，直至1999年開始的間諜事件、貿易衝突、南斯拉夫大使館事件和南海撞機一連串事件，美國才真正將北京視為戰略競爭者，開始更新與日本的同盟條件，擴大雙邊安全合作範圍（王緝思 2012, 199-201; 吳萬虹 2013b, 232; Friedberg 2011, 102-103）。

小布希執政時期，美國提高了在亞洲的駐軍，加強與東協國家的合作，開始將戰略重點從大西洋轉往太平洋，試圖在軍事上圍堵中共，阻止其成為區域單極。然而受到九一一事件與朝核危機干擾，美國希望暫時穩住北京成為「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responsible stakeholder），採取圍和，並未採取全面圍堵中共的政策（王緝思 2012, 106-108, 216, 320; Friedberg 2011, 58-59）。不過美國自70年代形成的東亞戰略，此時已有重大改變，從扶中制日，轉變為扶日防中。

至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後，中共經濟繼續逆勢成長、美日優勢更形縮小（Indyk et al. 2012, 7-11, 27-30）。中共重建東亞單極層級並晉升全球極數國的前景逐漸浮現，甚至可能造成體系的「權力移轉」，使得美中結構性矛盾愈加緊張。自2009年起，美國即加強與東亞各國的合作，展開一系列外交出訪（洪銘德 2015, 149; 張登及 2013, 69; Goldstein 2013, 263-268）。美國更在2010年時宣布重返亞洲政策（Back to Asia），在貿易摩擦、人民幣匯率、朝鮮核問題以及南海領土爭端等問題上，美中關係逐漸降至2001年南海撞機事件後的新低（王緝思 2016, 134, 142; 明居正 2013, 257-259; Indyk et al. 2012, 39-40, 47-50）。

與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完全不同，此次美國並未積極修復與中共之關係，也不理睬習近平提出的「中美新型大國關係」。歐巴馬政府甚至在2011年底提出總體戰略，表示美國要在未來數十年內，維持在亞洲的領導地位，遏制中共對此區域的威脅，並且於同年11月著手建構《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rans-Pacific Strategic Economic Partnership Agreement, TPP），回應中共一東協自由貿易協定（張登及 2013, 75; Indyk et al. 2012, 29-30, 38-41, 56-58）。此外，華府從2012年開始對中共周邊國家展開攻勢外交，舉辦多次聯合軍演，甚至在2015年促使日本通過新安保法，解禁集體自衛權，皆顯示美國對東亞區域的干預策略，已轉為全面制衡，並加強中日兩強的無政府競爭（蔡明彥、張凱銘 2015, 14-15; 劉復國 2016, 7-9）。

在全球單極中，由於缺乏全球競逐，美國最重要的利益就是避免新的全球極數國產生。在東亞次體系，中日兩強誰的區域位置較高，美國就會選擇制衡，並扶持另一方。因此，美國從80年代時制衡日本、拉攏中共，到90年代末轉而制衡中共，扶持日本，出現從第五定理向第四、第三與第二定理轉變的現象。至於美國制衡中共的力度，則與區域情勢有關。舉例來說，美國雖然在90年代末，逐漸調整策略，不過一直到2008、2009年的金融海嘯後，才正式展開制衡中共的舉動。導致美國轉換策略，比過往更加積極的原因，除中共國力持續崛起，亦因日本持續疲弱不振，迫使美國無法依靠日本來制衡中共，而必須親力親為，才能避免中共形成東亞層級秩序。

四、案例驗證小結

本節探討不同全球極數下，全球極數國對東亞次區域之干預。在多極案例下，東亞逐步從單強層級轉變為單強無政府，進而轉變為兩強無政府。其間即可發現全球極數國的影響，尤其是地理較鄰近的美蘇兩國。另一方面，美、蘇亦不情願負擔制衡日本的責任，時有卸責的舉動，以日本來降低另一全球極數國之位置，使得美蘇並非時時刻刻都在制衡東亞位置較高的日本，符合本研究認為全球多極體系中，全球極數國更重視全球情勢的假設。

在兩極的案例中，東亞體系從兩強無政府轉為兩強均勢，其間亦有全球極數國深刻的影響。冷戰初期，由於中共位置逐漸提高，日本相對孱弱，使得蘇

聯放棄中蘇同盟，開始制衡中共。70年代時，由於中共因文革等因素且受蘇聯包圍而削弱，而日本則不斷發展，因此給予美國拉攏中共的誘因，並開始貿易制衡日本，採取扶中防日的策略，在中日同受蘇聯威脅的條件下，形成東亞兩強均勢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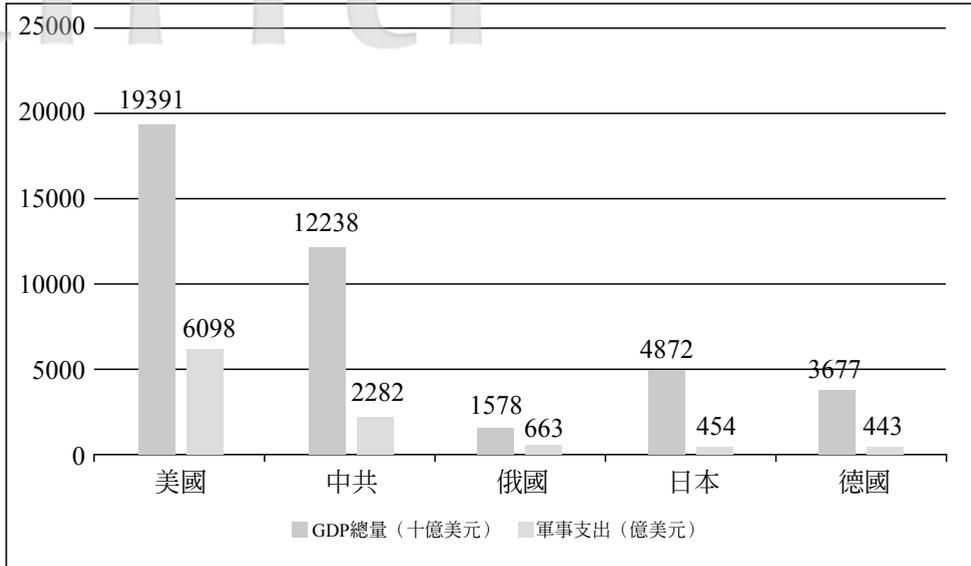
在單極的案例中，東亞於台海危機後由兩強均勢轉為無政府。當日本經濟疲憊，無力再挑戰區域霸權，且中共國力不斷提升，東亞兩強位置翻轉，美國即開始防範中共，不再制衡日本。最後更因2008年後金融危機，中共不僅超越且急速拉大與日本的經濟總量差距，使得美國無法僅憑日本制衡北京，必須親力親為，加大制衡力度，避免中共晉升區域霸權。單極要避免其他區域出現新的區域霸權，是其全球戰略的重中之重。因此蘇聯解體後，美國將潛在全球極數國視為戰略制衡對象，從俄羅斯到日本，當前則為中共。

伍、結論

Francis Fukuyama在1992年時提出歷史終結論，象徵普世對冷戰結束的憧憬和期待。不過當國際關係正式步入後冷戰時期，眾人卻驚訝Morgenthau式的權力鬥爭依然存在。因為Fukuyama所謂的歷史終結，僅看到國際體系因單極出現使大國競逐消弭，卻未看到全球層次對區域層次必然繼續干預。也就是說，國際政治的爭鬥並未終結，只是轉移重心。根據極數國定理，競爭從全球體系過去的兩極對抗，演變成全球單極對各大區域的干預。

雖然初步入後冷戰時，國際關係學者對體系定位仍有爭議。有些學者就認為美國終將遭到制衡，單極曇花一現（Huntington 1999, 35-49; Waltz 2000, 5-41）。圖3資料顯示，美國仍享有極大的經濟和軍事領先優勢。甚至有別於2008年金融海嘯的衰退印象，除了中共異軍突起，相對於各區域極數國，美國反而是逆勢成長，並且利用歐日盟友的頹勢，趁機修復雙方在後冷戰時期中貌合神離的現象。由於美國仍是全球唯一的區域霸權，直至有另一區域霸權出現之前，國際體系都仍將處於美國單極格局。因此美國與任何大國的衝突，主要並非限於全球層次的，更重要的是全球單極對區域層次的干預和防範，以及區域強國對全球極數國干預的反制。

圖3 2017年美中俄日德GDP總量與軍事支出對比



資料來源：World Bank (2018);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18).

在美國仍然是全球唯一的極數國時，最重要的就是操控和應對各區域體系內可能晉升的強國，因為這即攸關到美國單極地位的延續和穩定（Brzezinski 2007, 256）。本研究表明，如果美國能成功干預每一個區域體系不產生區域霸權，那麼美國的單極地位就能繼續保持下去。當美國無法阻止新區域霸權產生，就意味著美國單極和後冷戰時期的終結。不過這並不意味美國必須干預每一個區域體系，因為並非每一個區域體系對於美國來說都是至關必要。美國更可能傾向於干預那些可能出現區域霸權，或是出現區域霸權對美國全球位置危害甚大的區域體系，而不符合這些條件的區域，美國就有採行孤立主義、獨善其身的空間。⁴¹在可見的未來內，東亞、斯拉夫、和歐洲體系，是美國維持單極必須防範的關鍵區域。

在斯拉夫體系，俄羅斯長期以來皆是美國首要的制衡對象。美國透過北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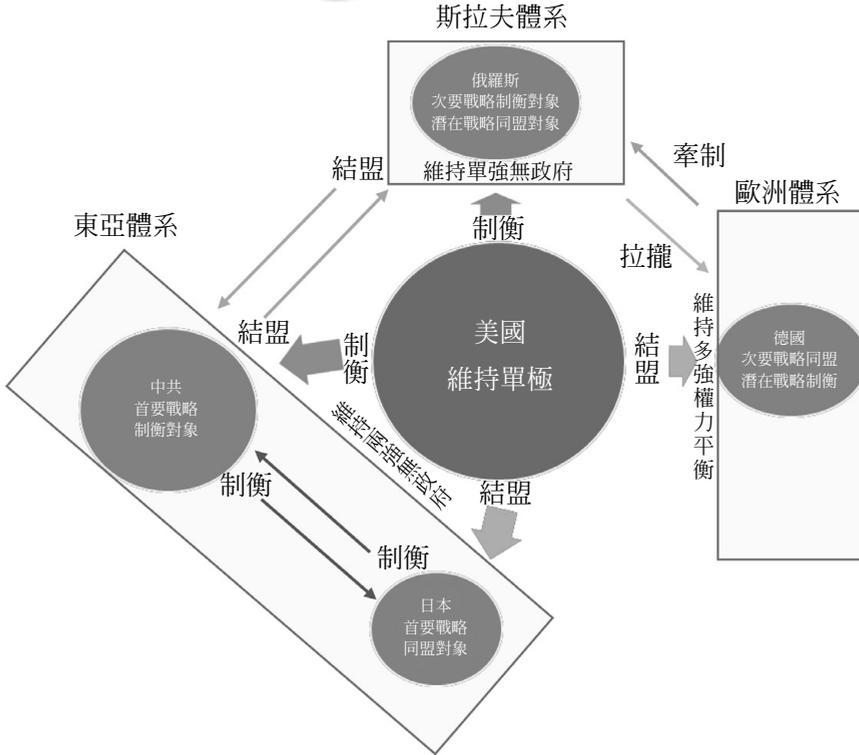
⁴¹ Mearsheimer (2014, 144-145) 就指出，全球極數國不會關注缺乏經濟潛力的區域，例如美國就很少關注非洲、波斯灣外的中東、東南亞和南亞。

東擴、阿富汗戰爭和顏色革命，成功阻止俄羅斯取得區域霸權地位。雖然由於伊拉克戰爭分散制衡俄羅斯的資源，並且致使油價暴漲，給予俄羅斯重新發展的契機，利用喬治亞戰爭和烏克蘭危機叩關區域霸權，不過美國亦利用頁岩油降低油價，聯合歐盟制裁俄羅斯，並且強化北約東擴，使得俄羅斯的挑戰程度有限。在歐洲體系，美國一貫奉行強化北約、制衡歐盟的戰略，避免歐盟發展獨立武力、削弱北約，或是藉由統合來成為單一政治實體。雖然在後冷戰前中期，歐洲多強均勢狀態一度有轉變跡象，然而由於歐盟制憲失敗以及2008年以降的金融危機和歐債危機，使得歐盟一體化的目標在中短期內難以實現，並且使得歐洲大國更仰賴美國，這種現象在烏克蘭危機後更為明顯。因此一度對美柔性制衡（soft balancing）的法、德，皆不若後冷戰初期般的雄心勃勃，使得歐洲多強權力平衡在後冷戰時期持續穩定。⁴²在東亞體系，美國曾將日本經濟崛起作為制衡對象，成功地阻止日本成為區域霸權，爾後因中東亂局干擾，使得美國的東亞政策相當消極，直至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機，中國展現經濟實力，成為東亞第一、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因此在日本無力制衡中國的情況下，迫使美國必須重返亞洲，給予再平衡，組建對北京的圍堵網，全力制止其成為東亞區域體系的霸主。

在可見的未來，東亞會是美國干預最深的區域體系，而斯拉夫體系次之。另一方面，雖然在中短期內，美國仍有能力避免中共成為區域霸權。然而從長期來看，當美國無力單獨制止中共時，就有利益支持俄羅斯成為斯拉夫區域霸權，誘使莫斯科聯手制衡中共成為東亞區域霸權。此即由於亞太地緣政治重要性近年大增，使得俄羅斯成為全球極數國較中共成為全球極數國對美國位置傷害較少，因此在兩害相權取其輕的全球層次運作邏輯之下，美國有誘因讓俄羅斯成為全球極數國，再卸責俄國，操縱美俄中三角，維持最強極數國之利益。

⁴² 不過英國脫歐則可能為此添加變數，因為英國脫歐相當可能大幅降低其在歐洲之位置，從而提升德法之位置，並且由於美英之間的特殊關係，因此亦會削弱美國對歐洲的影響力。

圖4 以全球－區域層次辯證關係預測未來美國對斯拉夫、歐洲與東亞體系之干預



資料來源：作者自行繪製。

回歸理論面來看，本文為何認為現實主義無法繼續採取單一層次的分析方式，而必須建立全球－區域雙層體系的結構分析？因為若繼續採取單層分析，就只能陷入極數計算的爭論，例如一超多強，卻無法解釋為何美國能進入到世界上每一個區域，而其他大國多卻只關心自身區域。

筆者認為，從守勢到攻勢，現實主義有因應國際實踐而進行理論蛻變的優良傳統。在後冷戰時期，現實主義者也應當跳脫靜態理論和單層分析的框架，將理論推向動態化與雙層分析，才能對情勢變化有完善的解釋，並因應其他理論的挑戰。不過在此也必須承認，本文所嘗試建立之理論，並非完美無缺。在

實際操作上，最容易引發爭議，就非區域劃界莫屬。正如同前文所提，由於目前學界並未存有一套公認的劃界標準，且本文又採取動態的體系觀，這便使得體系劃界、範圍容易因人而異，從而影響理論結果。關於劃界標準的爭議，或許就會是此理論建立之後，必須另起專文深入探討的重要部分。

（收件：107年4月30日，接受：107年11月9日）

Global System, Regional Sub-System and the Theorem of Polarity: A Case-Study Revision of Offensive Realism

Kuan-an Chen

Maste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Simon Teng-chi Chang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Abstract

This study argues that in order to fit into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t is necessary to establish a global-regional level of structural realism. Despite the contribution of Offensive Realism by bringing in regional hegemony to the global level, it challenges the traditional assumption of structural realism, which is the constant anarchy underlies the international system. However, due to the deficiency of Offensive Realism in explaining ontology, system-structure theory, as well as the regional level, it ultimately returns to the framework of Defensive Realism.

Therefore, the study uses Barry Buzan's and Richard Little's "interaction capacity" as the foundation of material construction and the ontology and system-structure of dynamic offensive realism, which is used to complement its regional level and adopt regions as the basis of global system, given that only regional hegemony is qualified for the global poles. Moreover, this study combines the global thesis of Offensive Realism to propose five global operational logics: the Theorem of Polarity.

Given that Offensive Realism has been fully addressed at the global level, the case validation of this study will focus on examining the parts of the Theorem of Polarity and its effects worldwide on the regional level. The study differentiates between the interwar period until World War II, the Cold War and the regional system of East Asia during the post-Cold War era, and discusses the influence of global poles on regions within different global polarities, the preference of interference of structures,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of the global level within regional polarity-structure transformation.

Keywords: Structural Realism, Material Constructivism, Global-regional Level, Theorem of Polarity

參考文獻

- 王輯思編，2012，《布什主義的興衰》，北京：世界知識。Wang, Ji-Si. 2012. *Bu shi zhu yi de xing shuai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Bushism]*. Beijing: World Affairs Press.
- 王輯思，2016，《大國戰略》，北京：中信。Wang, Ji-Si. 2016. *Da guo zhan lue [Great Power Strategy]*. Beijing: Citic Press.
- 王輯思、徐輝、倪峰編，2007，《冷戰後的美國外交（1989-2000）》，北京：時事。Wang, Ji-Si, Hui Xu, and Feng Ni. 2007. *Leng zhan hou de mei guo wai jiao (1989-2000) [U.S.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Beijing: Current Affairs Press.
- 天津社會科學院日本問題研究所譯，信夫清三郎，1980，《日本外交史》，北京：商務印書館。Tianjin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trans., Shinobu Seiburou. 1980. *Ri ben wai jiao shi [The history of Japanese diplomatic, 日本外交史]*. Beijing: The Commercial Press.
- 吳萬虹譯，中西寬著，2013a，〈摸索獨立的協調：70年代的日本外交〉，五百旗頭真主編，《戰後日本外交史：1945-2010》：106-140，北京：世界知識。Wu, wanhong trans., Nakanishi Huroshi. 2013. “Mo suo du li de xie diao: 70nian dai de ri ben wai jiao” [Overcoming the crises: Japanese diplomacy in the 1970's]. In Iokibe Makoto, ed., “Zhan hou ri ben wai jiao shi: 1945-2010”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Postwar Japan, 戰後日本外交史], pp. 106-140. Beijing: World Affairs Press.
- 吳萬虹譯，五百旗頭真著，2013b，〈如何評價戰後日本外交〉，五百旗頭真主編，《戰後日本外交史：1945-2010》：209-238，北京：世界知識。Wu, wanhong trans., Iokibe Makoto. 2013. “Ru he ping jia zhan hou ri ben wai jiao” [Conclusion: what was postwar Japanese diplomacy?]. In Iokibe Makoto, ed., “Zhan hou ri ben wai jiao shi: 1945-2010”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Postwar Japan, 戰後日本外交史], pp. 209-238. Beijing: World Affairs Press.

- 吳萬虹譯，村田晃嗣著，2013c，〈「國際國家」的使命與苦惱：80年代的日本外交〉，五百旗頭真主編，《戰後日本外交史：1945-2010》：141-170，北京：世界知識。Wu, wanhong trans., Murata Kouji. 2013. “Guo ji guo jia’ de shi ming yu ku nao: 80nian dai de ri ben wai jiao” [The mission and trials of an emerging international state: Japanese diplomacy in the 1980's]. In Iokibe Makoto, ed., “Zhan hou ri ben wai jiao shi: 1945-2010” [The Diplomatic History of Postwar Japan, 戰後日本外交史], pp. 141-170. Beijing: World Affairs Press.
- 沈志華編，2007，《中蘇關係史綱》，北京：新華。Shen, Zhi-Hua. 2007. *Zhong su guan xi shi gang* [History of Sino-Soviet Relations]. Beijing: Xinhua Publishing House.
- 周永生等譯，五百旗頭真著，2012a，〈戰後的日美關係：超越對抗和摩擦〉，五百旗頭真主編，《日美關係史》：320-335，北京：世界知識。Zhou, yong-sheng et al. trans., Iokibe Makoto. 2012. “Zhan hou de ri mei guan xi: chao yue dui kang he mo ca” [Post-war Japan-US Relations: Beyond Confrontation and Friction]. In Iokibe Makoto, ed., “Ri mei guan xi shi” [The History of US-Japan Relations, 日美關係史], pp. 320-335. Beijing: World Affairs Press.
- 周永生等譯，田所昌幸著，2012b，〈新自由主義的時代（20世紀80年代）〉，五百旗頭真主編，《日美關係史》：258-285，北京：世界知識。Zhou, yong-sheng et al. trans., Tanaka Akihiko. 2012. “Xin zi you zhu yi de shi dai (20shi ji 80nian dai)” [The 1980s: The Decade of Neoliberalism]. In Iokibe Makoto, ed., “Ri mei guan xi shi” [The History of US-Japan Relations, 日美關係史], pp. 258-285. Beijing: World Affairs Press.
- 周永生等譯，佐佐木卓也著，2012c，〈日美協調的果實（20世紀60年代）〉，五百旗頭真主編，《日美關係史》：205-229，北京：世界知識。Zhou, yong-sheng et al. trans., Sasaki Takuya. 2012. “Ri mei xie diao de guo shi (20shi ji 60nian dai)” [The fruit of Japan-US coordination(1960s)]. In Iokibe Makoto, ed., “Ri mei guan xi shi” [The History of US-Japan Relations,

日米關係史], pp. 205-229. Beijing: World Affairs Press.

周永生等譯，添谷芳秀著，2012d，〈危機中的日美關係（20世紀70年代）〉，五百旗頭真主編，《日美關係史》：230-257，北京：世界知識。Zhou, yong-sheng et al. trans., Soeya Yoshihide. 2012. “Wei ji zhong de ri mei guan xi (20shi ji 70nian dai)” [The 1970s: Stresses on the Relationship]. In Iokibe Makoto, ed. “*Ri mei guan xi shi*” [*The History of US-Japan Relations, 日米關係史*], pp. 230-257. Beijing: World Affairs Press.

周永生等譯，簀原俊洋、服部龍二，2012e，〈第一次世界大戰與日美關係的再調整〉，五百旗頭真主編，《日美關係史》：84-109，北京：世界知識。Zhou, yong-sheng et al. trans., Minohara Tosh and Ryuji Hattori. 2012. “Di yi ci shi jie da zhan yu ri mei guan xi de zai diao zheng” [The Great War and Shifting Relations]. In Iokibe Makoto, ed., “*Ri mei guan xi shi*” [*The History of US-Japan Relations, 日米關係史*], pp. 84-109. Beijing: World Affairs Press.

明居正，2013，《大美霸權的浮現：後冷戰時期大國政治的邏輯》，台北：五南。Ming, Ju-Zheng. 2013. *Da mei ba quan de fu xian: hou leng zhan shi qi da guo zheng zhi de luo ji* [*The Emergence of Great American Hegemony: The Logic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in the Post Cold War*]. Taipei: Wu-Nan Book Inc.

林添貴譯，Brian Crozier著，2003，《蘇聯帝國興衰史》，台北：智庫。Lin, tian-gui, trans., Brian Crozier. 2003. *Su lian di guo xing shuai shi*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Soviet Empire*]. Taipei: Triumph Publishing.

洪銘德，2015，〈美國重返亞洲政策之研究〉，《全球政治評論》，51：147-165。Hong, ming-de. 2015. “mei guo zhong fan ya zhou zheng ce zhi yan jiu” [Pivot to Asia: A Study of U.S. Regional Strategy]. *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 51: 147-165.

唐欣偉，2016，〈檢討米爾斯海默對大國之判準——兼論其對中國地位之評估〉，《遠景基金會季刊》，17(1)：1-34。Tang, xin-wei. 2016. “jian tao mi er si hai mo dui da guo zhi pan zhun - jian lun qi dui zhong guo di wei zhi ping gu” [Examining Mearsheimer’s Criteria on Great Power: Assessing Chi-

na's Status]. *Prospect Quarterly*, 17(1): 1-34.

-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中居良文，2002a，〈有關台灣的政策協商〉，西原正主編，《美日同盟的新挑戰》：81-124，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R.O.C. trans., Nakai Yoshifumi. 2002. "You guan tai wan de zheng ce xie shang" [Policy Coordination on Taiwan]. In Nishihara Masashi, ed., "*Mei ri tong meng de xin tiao zhan*" [*The Japan-U.S. Alliance New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日米同盟關係の新たな局面], pp. 81-124. Taipei: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R.O.C.
-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村田晃嗣，2002b，〈美日聯盟是否因新指針而更具效能？〉，西原正主編，《美日同盟的新挑戰》：1-30，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R.O.C. trans., Murata Kouji. 2002. "Mei ri lian meng shi fou yin xin zhi zhen er geng ju xiao neng?" [Do the Guidelines Make the Japan-U.S. Alliance More Effective?]. In Nishihara Masashi, ed., "*Mei ri tong meng de xin tiao zhan*" [*The Japan-U.S. Alliance New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日米同盟關係の新たな局面], pp. 1-30. Taipei: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R.O.C.
- 國防部史政編譯室譯，須藤季夫，2002c，〈美、日及東南亞國協之三邊關係〉，西原正主編，《美日同盟的新挑戰》：125-152，台北：國防部史政編譯室。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R.O.C. trans., Sudo Sueo. 2002. "mei, ri ji dong nan ya guo xie zhi san bian guan xi" [Toward a Japan-U.S.-ASEAN Nexus]. In Nishihara Masashi, ed., "*Mei ri tong meng de xin tiao zhan*" [*The Japan-U.S. Alliance New Challenges for the 21st Century*, 日米同盟關係の新たな局面], pp. 125-152. Taipei: Ministry of National Defense R.O.C.
- 張登及，2003，〈建構中國：不確定世界的大國地位與大國外交〉，台北：揚智文化。Chang, Simon Teng-chi. 2003. *Jian gou zhong guo: bu que ding shi jie de da guo di wei yu da guo wai jiao*. [Writing China: Identity Formation and Great Power Diplomacy]. Taipei: Yang-Chih Book Co., Ltd.
- 張登及，2008，〈地緣因素與新現實主義——以冷戰後美中地緣競逐為例〉，《政治學報》，45：95-137。Chang, Simon Teng-chi. 2008. "di yuan

airiti

yin su yu xin xian shi zhu yi - yi leng zhan hou mei zhong di yuan jing zhu wei li” [Geopolitical Factors and Neorealism: A Case Study of US-China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after the Cold War].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45: 95-137.

張登及，2009，〈理論改良還是理論缺口：新現實主義與冷戰後中美地緣競爭的分析〉，《世界經濟與政治》，3：6-18。Chang, Simon Teng-chi. 2009. “li lun gai liang hai shi li lun que kou: xin xian shi zhu yi yu leng zhan hou zhong mei di yuan jing zheng de fen xi” [Neorealism: Theoretical Enforcement or Opening: A Case Study of Sino-US Geopolitical Competition after the Cold War]. *World Economics and Politics*, 3: 6-18

張登及，2013，〈「再平衡」對美中關係之影響：一個理論與政策的分析〉，《遠景基金會季刊》，14(1)：53-98。Chang, Simon Teng-chi. 2013. “Zai ping heng’ dui mei zhong guan xi zhi ying xiang: yi ge li lun yu zheng ce de fen xi” [The Impact of “Rebalancing” on U.S.-China Relations: An Analysis of Theory and Policy]. *Prospect Quarterly*, 14(1): 53-98.

張登及，2017，〈地理：命運的鎖鍊、自由的航標〉，林添貴譯，Robert Kaplan著，《地理的復仇》：5-12，台北：麥田出版。Chang, Simon Teng-chi., Lin, tian-gui, trans. 2017. “Di li: ming yun de suo lian, zi you de hang biao” [Geography: the Chains of Fate or the Beacon of Freedom]. In Robert Kaplan, “Di li de fu chou” [The Revenge of Geography: What the Map Tells Us About Coming Conflicts and the Battle Against Fate], pp. 5-12. Taipei: Rye Field Publishing.

張雲雷譯，Geir Lundestad著，2014，《大國博奕》，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Zhang, yun-lei, trans., Geir Lundestad. 2014. *Da guo bo yi* [East, West, North, South: Major Development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Since 1945]. Beijing: China Renmin University Press.

劉復國，2016，〈當前南海問題的國際安全戰略趨勢〉，《全球政治評論》，53：1-10。Liu, fu-guo. 2016. “Dang qian nan hai wen ti de guo ji an quan zhan lue qu shi” [Development of South China Sea Issue and Its Impact

o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Review of Global Politics*, 53: 1-10.

- 蔡明彥、張凱銘，2015，〈「避險」戰略下大國互動模式之研究：以美中亞太戰略競合為例〉，《遠景基金會季刊》，16(3)：1-66。Tsai, Ming-yen, and Kai-ming Chang. 2015. “‘Bi xian’ zhan lue xia da guo hu dong mo shi zhi yan jiu: yi mei zhong ya tai zhan lue jing he wei li [Interaction Patterns of Great Powers under ‘Hedging’ Strategies: A Case Study of U.S.-China Strategic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 *Prospect Quarterly*, 16(3): 1-66.
- 謝益顯編，2009，《中國當代外交史（1949-2009）》，北京：中國青年出版社。Xie, yi-xian. 2009. *Zhong guo dang dai wai jiao shi(1949-2009)*. [History of Contemporary Chinese Diplomacy(1949-2009)]. Beijing: China Youth Publishing.
- Buzan, Barry, and Richard Little. 2000. *International Systems in World History: Remaking the Stud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Buzan, Barry, and Ole Waever. 2003. *Regions and Powers: The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Buzan, Barry. 2004.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Great Powers: World Politic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 Brzezinski, Zbigniew. 2007. *Second Chance: Three Presidents and the Crisis of American Superpower*. New York, NY: Basic Books.
- Cox, Robert. 1986. “Social Forces, States, and World Orders: Beyo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pp. 204-254.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Cohen, Saul B. 2009. *Geopolitics: The Geograph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Donnelly, Jack. 2000.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ukuyama, Francis. 1992.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New York, NY: Free Press.

- Friedberg, Aaron L. 2011. *A Contest for Supremacy: China, America, and the Struggle for Mastery in Asia*. New York, NY: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 Gilpin, Robert. 1981. *War and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Goldstein, Avery. 2013. "U.S.-China interactions in Asia." In David Shambaugh, ed., *Tangled Titans: The United States and China*, pp. 263-292. Lanham, MD: Rowman & Littlefield.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 Huntington, Samuel P. 1999. "The Lonely Superpower." *Foreign Affairs*, 78(2): 35-49.
- Hobsbawm, Eric J. 1996. *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 New York, NY: Vintage Books.
- Hurrell, Andrew. 2006. "Hegemony, Liberalism and Global Order: What Space for Would-Be Great Powers?" *International Affairs*, 82(1): 1-19.
- Indyk, Martin et al. 2012. *Bending History: Barack Obama's Foreign Policy*. Washington, DC: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 Judt, Tony. 2005. *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 New York, NY: Penguin Press.
- Kelly, Robert K. 2007. "Security Theory in the 'New Regionalism'."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9: 197-229.
- Keohane, Robert O. 1986. "Realism, Neorealism, and the Study of World Politics."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pp. 1-26.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Kissinger, Henry A. 1994. *Diplomacy*. New York, NY: Simon & Schuster.
- Kissinger, Henry A. 2011. *On China*. New York, NY: Penguin Press.
- Keylor, William R. 2006. *The Twentieth Century world and Beyond: an International History Since 1900*.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yne, Christopher. 2002/2003. "The 'Poster Child for Offensive Realism': America

- as a Global Hegemon.” *Security Studies*, 12(2): 120-164.
- Lake, David A. 2009. *Hierarchy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New York,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Morgenthau, Hans. 1973. *Politics Among Nations: The Struggle for Power and Peace*. New York, NY: Knopf.
- Mearsheimer, John. 2014.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 New York, NY: Norton.
- Nye, Joseph S. 2002. *The Paradox of American Power: Why the World’s only Superpower Can’t Go it Alone*.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Prys, Miriam. 2010. “Hegemony, Domination, Detachment: Differences in Regional Powerhood.”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12: 479-504.
- Pashakhanlou, Arash Heydaria. 2013. “Back to the Drawing Board: A Critique of Offensive Realism.”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27(2): 202-225.
- Ruggie, John. 1986. “Continuity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World Polity: Toward a Neorealist Synthesis.” In Robert O. Keohane, ed., *Neorealism And Its Critics*, pp. 131-157.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Rich, Norman. 2003. *Great Power Diplomacy Since 1914*. Boston, MA: McGraw-Hill.
- Schmidt, Brian C. 2004. “Realism as Tragedy.”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30: 427-441.
- Schweller, Randall L. 1998. *Deadly Imbalance: Tripolarity and Hitler’s Strategy of World Conquest*. New York, N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 Sterling-Folk, Jennifer. 2002. “Realism and the Constructivist Challenge: Rejecting, or Rereading.” *International Studies Review*, 4(1): 73-97.
- Snyder, Glenn H. 2002. “Mearsheimer’s World Offensive Realism and the Struggle for Securit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7(1): 149-173.
- 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 2018. “SIPRI Military Expenditure Database.” <https://www.sipri.org/databases/milex> (Jan 9, 2019).
- Tammen, Ronald L. et al. 2000. *Power Transitions: Strategies for the 21st Century*.

- New York, NY: Chatham House Publishers of Seven Bridges Press.
- Toft, Peter. 2005. "John J. Mearsheimer : An Offensive Realist between Geopolitics and Power."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alties and Development*, 8: 381-408.
- Valeriano, Brandon. 2009. "The Tragedy of Offensive Realism: Testing Aggressive Power Politics Models."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35: 179-206.
- Waltz, Kenneth N. 1979.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Boston, MA: McGraw-Hill.
- Waltz, Kenneth N. 2000.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5(1): 5-41.
- Waltz, Kenneth N. 2002. "Structural Realism after the Cold War." In John G. Ikenberry, ed., *America Unrivaled: Future of the Balance of Power*, pp. 29-67. New York,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Waltz, Kenneth N. 2008. *Realism and International Politics*. New York, NY: Routledge.
- Wendt, Alexander. 1999. *Social 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 World Bank. 2018. "World Bank National Accounts Data, and OECD National Accounts Data Files." <http://data.worldbank.org/> (Jan 9, 2019).